

犹在镜中

■ 戴锦华访谈录

you zai
jingzhong



知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戴锦华著. -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9. 6
(新锐文库)

ISBN 7-5015-2027-5

I. 犹... II. 戴... III. 戴锦华-学术思想 IV. 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0751号

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城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兴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9年6月第一版 1999年6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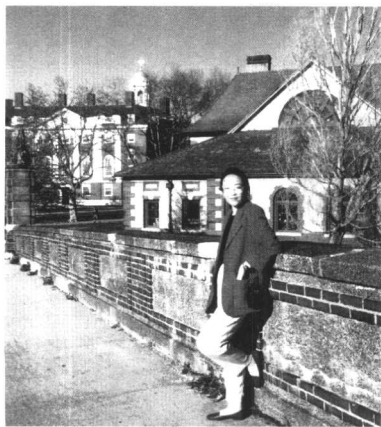
开本:85x1168 1/32 印张:9.625 字数:200千字

印数:1-5000册

定价:18.80元

戴锦华照片

右下 在沙漠
左下 哈佛（1999年）
左上 老街道



戴锦华照片

左下
右上
右下

纽约(199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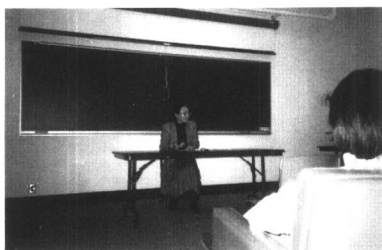
冬·北京

敦煌月牙泉(1995年)



戴锦华照片

左下 国际研讨会上(香港 1998年)
左中 演讲(美国康奈尔大学·1995年冬)
左上 答学生问(1998年)
右下 与学生在一起(1998年秋·北京)



戴锦华照片

右下

在讨论课上 (1998年)

右中

与访谈者周亚琴 (1998年)

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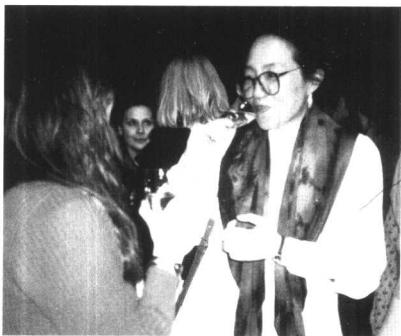
课间 (1998年)

左下

与访谈者吴晓黎 (1998年)

左上

在法国克岱耶国际妇女电影节上 (1997年)



戴锦华照片

右下

演讲（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1995年）

右上

课间（1988年，左二为访谈者朴贞姬）

左下

课间（1988年）

左中

与访谈者王昶（198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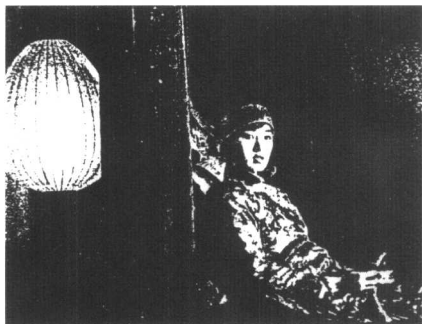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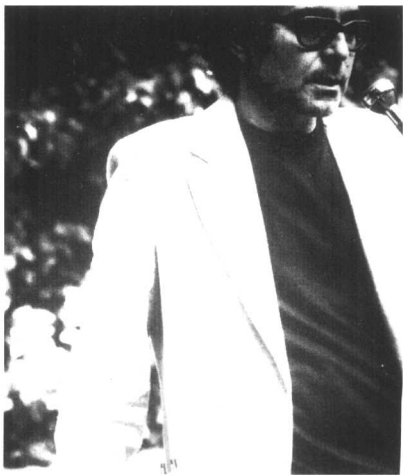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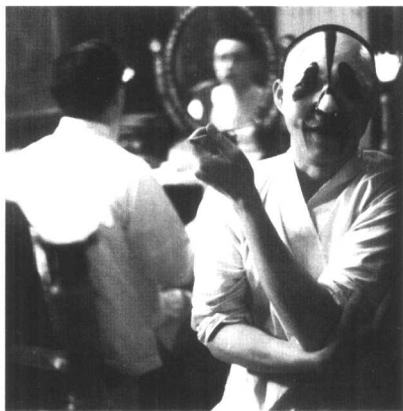
左上

在讨论课上（1988年）



《犹在镜中》插图

右下 法国导演戈达尔
 右中 活着 (海外招贴·1996年)
 右上 霸王别姬 剧照 (1993年)
 左下 法国电影《中国姑娘》 剧照·导演戈达尔
 左上 大红灯笼高高挂 剧照 (1991年)



《犹在镜中》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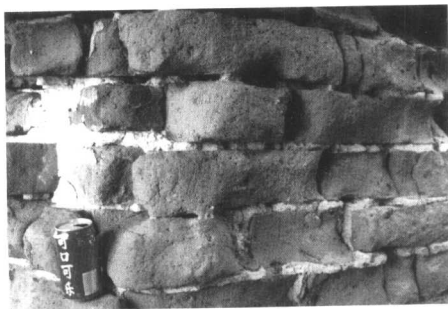
左下
左上
右上
右下

街头海报 (1997年·北京)

长城上的垃圾

福柯

街景与时尚 (1997年·北京)





《犹在镜中》插图

左 右
周瓊采访
杨凯麟采访

孟悅、戴錦華

二人携手，
為女性文學評論拓荒

■楊凱麟／採訪



長

孟悅與戴錦華的相遇，是中國女性文學評論領域的一個重要契機。她們的攜手合作，不僅豐富了女性文學的理論探討，也為女性文學評論拓荒了新的領域。

孟悅，原名孟悅，是台灣著名的女性文學評論家。她以其敏銳的觀察力和深刻的批判精神，在女性文學評論領域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戴錦華，則是中國大陸著名的女性文學評論家，她以其對女性文學的深入研究和獨特見解，在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

她們的合作，始於她們對女性文學的共同熱愛和追求。她們通過不斷的交流與碰撞，形成了獨特的評論風格。她們的評論不僅關注女性文學的文本本身，更關注女性文學與社會、文化、政治的互動關係。她們的評論具有強烈的批判性和啟發性，為女性文學評論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她們的攜手合作，不僅豐富了女性文學的理論探討，也為女性文學評論拓荒了新的領域。她們的評論具有強烈的批判性和啟發性，為女性文學評論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她們的評論不僅關注女性文學的文本本身，更關注女性文學與社會、文化、政治的互動關係。她們的評論具有強烈的批判性和啟發性，為女性文學評論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大走勢

戴錦華： 觀照自我與世界的 鏡面

——《猶在鏡中》

文周瓊

戴錦華的《猶在鏡中》是一部關於女性文學評論的著作。這本書不僅是對女性文學的深入探討，也是對自我與世界關係的深刻反思。戴錦華通過對女性文學的評論，揭示了女性文學在社會、文化、政治中的位置，以及女性文學對女性自我意識的塑造作用。

戴錦華的評論具有強烈的批判性和啟發性。她指出，女性文學不僅是女性自我意識的反映，也是女性對社會、文化、政治的批判。她認為，女性文學通過對女性形象的塑造，揭示了女性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以及女性對自我意識的塑造作用。她認為，女性文學不僅是女性自我意識的反映，也是女性對社會、文化、政治的批判。

戴錦華的評論具有強烈的批判性和啟發性。她指出，女性文學不僅是女性自我意識的反映，也是女性對社會、文化、政治的批判。她認為，女性文學通過對女性形象的塑造，揭示了女性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以及女性對自我意識的塑造作用。她認為，女性文學不僅是女性自我意識的反映，也是女性對社會、文化、政治的批判。

犹在镜中（代序）

在久已无法对分行文字产生兴趣之后，在留美学生的电脑网络杂志《华夏文摘》上，读到一首短诗，为《第八个是铜像——写给一代人》^①。读了，读进去了。这并非一首“好”诗，也可以加上标点，也可以不予分行，连起来，便是一篇短文。读到的，是一份真切，是一点认同。诗中写到了似乎悄然失落在众多大叙事的缝隙之间的“一代人”：

“……一谈起童年，我们就想起阿尔巴尼亚。没有红与黑也没有安娜卡列尼娜，我们的经典就是第八个是铜像。

那时候，没人说古德毛林或好阿游；那时候，我一说‘消灭法西斯’，你就说‘自由属于人民’。这个暗号使我们的见面神圣又亲密，我们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中长大。

关于第八个是铜像的反反复复的话题里，无师自通的我们很早就很先锋，玩过了结构主义也玩过了意识流。虽然那个春天我们贫乏而寂寞，甚至还不太明白，在妈妈生下我们的壮举中，爸爸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尽管诸多繁复斑驳的断代法，造就 80 年代的热闹和 90 年代的喧哗，尽管一代又一代人在书写自己的历史并试图铸造自己的“历史地位”，但从未想到我属于某“一代”人。出生在五六十年代之交，似乎是一种尴尬。由于幸运，也许是年幼，没有饥饿的记忆。只是外婆小院里茂盛的丁香，盛

11178/06

夏正午寂寞怒放的向日葵，和晴朗灰蓝色的冬日屋檐下的冰凌。如堕梦中地凭考试进入了大学，身份栏上的“应届毕业生”，便宣告了“本人没有故事”。只有“文革”记忆——像从天上掉下来的劫数：邻家没踝的古瓷碎片，乱棍之下死者迅速肿胀发臭的黑紫色的尸体，公共厕所“红绒大手”的传说。然而，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老插”对我的夸夸其谈笑论：“你那是‘文革’？你懂‘文革’？你肯定只顾在红卫兵面前筛糠来着。”不错，“杀出一个红八月”那年，我7岁，在每天可能到来的“血洗下四条黑胡同”的红小将近旁瑟瑟发抖，仅仅是7岁时的怕死贪生。对声称要向红卫兵宣讲“十六条”的母亲深感不信任，以7岁的直觉知道那没有用，不然便没有头大如斗的女尸，便没有弥散小巷的焚尸的浓烟。不是“文革”中任何的“一代”，因之无“权”议论或讲述。但那段日子——7岁到17岁，是一个深刻的“情结”，一种至今未曾痊愈的疾患——其症状却是被下一代人诊断出来的。1987年的秋冬，在温泉结核病院里名副其实地死里逃生，和一些幼我四到七岁的孩子们为伍，“老妇聊发少年狂”。分手时，恋恋不舍，一男孩云：“你知道和你在一起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自恃一好老师，静候几句恭维。下文竟是：“我们才知道真的有过一场‘文革’。”如雷贯顶。一女孩补充：“知道吗？你言必称‘文革’。”想到那位逢人必谈青纱帐和抗日的老伯，和那位饮杯酒便呼鸭绿江的大叔，顿感衰老。但在老插的笑谈和彼时大学生的感叹之间，我找不到自己“代”的归属。历史无疑有许多缝隙，缝隙间是些无名的生存。

年事日长，鬓有白发之后，似乎懂得更多些。记忆固置于某一时段，不仅由于爱之深、恨（或曰怕）之切；而且由

于那个时段、那段事件、那份经历被赋予了历史的合法性，因而也就具有了讲述的合法性。它在日复一日的讲述之中膨胀，渐次遮没了其他，乃至一切。一如一场以胜利告终的战争的荣耀、讨饭时恶狗留下的伤疤之于昨日，一如“文革”的血腥、恐怖、苦难之于80年代的中国，一如一段创业发家的既往史之于今天。因此，尽管以电影为“饭碗”已经14年，我遗忘了《第八个是铜像》，遗忘了更多的童年少年岁月中的那份寂寞、荒芜与贫瘠，无师自通与极度无知。意识到也许有一个未获命名的“我们”，也许可以称为“一代人”。对于诗作者刘擎，那是在海外（用诗中的话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个聚会的暗夜里涌来的回忆，于是“今晚/我们的童年/是一部黑白电影”。但这仍远不是全部。对于另一些人，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由于性别，也由于阶级；那或许是一份真实，它在“文革”结束十数年后才获得合法的显影，进而成就了一段阳光灿烂的讲述。剥落了厚重的血色油彩的，不是、不仅是岁月，而是永恒的权力机器的必要程序。于是，在同代人、同性作家的笔下，伟大叙事的画面上，也可以裸露出一角“守望”者的“空心岁月”；在后来者的反讽里，它也可以被书写为“真情如歌”。于是，7岁的恐惧也可能比“今夜有暴风雪”更迷人、真实而合法。

十分“幸运”，自有了合法与不合法的记忆，便深感到自己生活在“历史”中。10岁，生逢“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大时代，“在火红的年代做一个火红的人”；20岁，新时期的开端处，“兴国有责，百废待举”；30岁，“我们已来到黄金时代的门口”，于是“撞击世纪之门”，否则“中国将被开除球籍”。将来未来的40岁，将足踏世

纪之交，面临千年之初。于是，曾经、也理应始终沉浸在对未来的无穷憧憬与畅想之中；未来展现了幸福伸延的时间链条，在过去与未来间链接起历史的故事。将及不惑，未来式的历史书写与过去式的历史书写两相对照，不断地成为并不刻毒却不无辛酸的嘲弄，身历并目击的是一个个美丽“未来”变为不甚灿烂、间或苦涩的寻常岁月。于是，承受着班驳陆离的历史的遗产。而且，无所谓独有或独特。因为“本世纪所有的预言都是关于革命的预言，本世纪的全部记忆都是革命失败的记忆”。而且审判失败者，如果不是人类的通病，便是历史的惯例。“感谢上帝，我不是权力的轮子。我只是压在轮子底下的活人之一。”泰戈尔的名句传递的仍只是一份幻觉、一幅镜象，一个构造、填充自我、个人的必需。历史在它的中断处伸延。无论是黑格尔的“历史”，还是福山的“历史”，在中国都远未终结。但始终伸延的，不如说是岁月的绵延，岁月之后，是彼此抵牾的历史的叙述。

幸运地体味到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这了悟并不来自于高歌猛进的进步记录，而是来自于一份镜中的岁月，来自于光洁之镜与破碎之镜前的狂喜与迷惘。笃信过某种历史的陈述，质疑并参与过撕裂它们；每一次，自以为“真理在胸旗在手”；所不知的是，一场伟大的进军所击破的只是一面镜子，如有所成就，也只是在一面新的镜前映照出一个不再丑陋、模糊的自我。于是，喜爱这样的修辞：“镜城”、“犹在镜中”、“阿丽丝镜中奇遇”。不错，有着结构、后结构主义大师拉康、阿尔图塞的“苍白的洋爸爸”的影子，但同时（或许更多）是一份真切的体验。明白：生的太迟的人们，其永远的悲哀是在自己的经验和表达之间始终横亘着黄肤色的或白肤色的昔日大师。我们必须借助他们的眼睛，或者说

必须凝视着他们所构造的镜象,尽管我们的初衷是破镜而出。尤其是中国再次被纳入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因之只能处于“滞后”的“历史”时段的今天,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身份之外,是分外尴尬暧昧的女人身。于是,这真切的体验是,经历了太多的“颠倒被颠倒的历史”,太多的“平反昭雪”、拨乱反正,昨日的禁忌瞬时成了今日时尚;此刻的边缘正是彼时的中心。类似的迷惘,并非“69届初中生”所独有。因此,像始终置身于一座镜的城池或镜的回廊之中,杂陈并置的历史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彼此冲突,彼此借重,相互否定又相互印证,犹如相向而立之镜,在无穷的交相映照之间形成影像重叠、幻影幢幢、真假莫辨的深洞。镜中的奇遇,便是在奋不顾身的投奔中远离你狂恋的目标,在绝望的逃离中跟你恐惧的对象撞个正着。而且,不会幸运地出现一种神奇的力量为我们一页页掀开字迹斑驳、反复涂抹过的“羊皮书”,更不会遭遇一场飓风,卷去镜城。“百年孤独”,毕竟只是一种魔幻的书写。在吴文光的纪录片《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中,看到一个场景,那是“眼镜蛇”女子摇滚乐队在排练一场名之为《我的1966》的演出,其中的一句是:“哦,1966,我的1966——红色列车满载着幸福羔羊。”主唱对此处的提示是:“这儿要空,唱出那种感觉来——那时候的人,有点……有点缺心眼儿。”大笑之后,是怆楚。不是为那不曾从属、也被拒绝从属的上“一代人”,而是——后来者的机敏与刻薄来自于窥破了前人为之献身的目标只是一幅虚假的镜象,一场荒唐的镜恋;但是在“眼镜蛇”和摇滚乐之间,在粗犷的表演与英姿勃发的少女之间,在边缘文化、反叛姿态与恣肆洒脱之间,拥抱并展现出的何尝不是又一幅合法的镜象。每一代人,从镜城

中突围，在镜城中失陷。悲哀不在于记忆与遗忘，不在于真实与谎言，而在于一次次的窥破之后，所拥有的仍是一份镜城春秋。

历史与叙事。历史永远是一种叙事，权威者的叙事。明了了“历史”之于我们只能是一种“书写”，一种获特赦或恩准的“记录”与书写。历史永远在“历史”之外。无须后结构主义大师们的洞悟或教诲，经历中国的岁月，便足以领悟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历史”仅仅是“胜利者的清单”。《第八个是铜像》的日子里曾读过只有一位主帅、一位旗手的现代文学史。大学就读四年间，所学的现当代中国史、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便几经增补，几易其稿，不仅是再估价与新沉浮；而且是“原画复现”或“史海钩玄”。重写，成就的是一次碎镜，获取的是却不一定就是真理。六月，在四季如春又丑陋庞杂的洛杉矶重与老友孟悦对坐，听她娓娓而谈清末民初的文化史。一句简单的背景交代：“曾国藩当时面临两大敌手：洋人和太平天国……”心中一动，哑然失笑。尽管经历了历史文化反思运动，尽管经历了诸多的重写、改写、反思、颠覆，尽管赶时髦地读过畅销书《曾国藩》、《红顶商人》，但从未“真的”从曾国藩的角度去思索过这段历史。在读过、背过、考过的历史书上，这一切是从太平天国的视点来呈现的。从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我所熟知的是“天国春秋”，能如数家珍的是忠王李秀成、翼王石达开、英王陈玉成。为了当年《朝霞丛刊》上的一部从未拍成的电影剧本，陈玉成一度成了我16岁时的梦中情人。在自以为走过了不归之路后，已拥挤杂乱不堪的个人“内存”并未真正“删除”曾成功内在化的一切。

另一个反例对自己说来同样惊心。那是一次偶然的阅

读。在减价旧书市上发现了一本久寻不到的小书，是署名竟陵子的《史海钩玄》，副题是“武汉裸体大游行”^②，似乎是很有商业价值的题目，却显然全无商业意味地弃置于地摊上。听朋友热情地谈起过，竟在这里见到。很脏，很破，但买下了，读了。确实没有商业价值。大革命史被遗漏的一段，或许可当作未来的妇女史中的一节。很久了，没有被一本书冲得血往上撞，泪往上涌。强忍住。历史之手对我个人的书写之一，便是身为女人，却崇尚“有泪不轻弹”——在同样令我会心的王小波的作品中，这大概算彼时施虐、受虐文化成功的一例。竟陵子的“钩玄”造成的冲击，不仅在她以大量的访谈、详尽的史料、朴素而迷人的文字，再现了大革命时代；不仅在于幸存者和亲历者讲述的那些撕肝裂胆的故事，而且在于我震惊——震惊于自己精神上的流俗，震惊于不自知间的遗忘与改写。尽管坚定并理性地拒绝简单而轻松地“告别革命”，但我有效地遗忘了现代史那些特殊的年份，遗忘了其中的血雨腥风，遗忘了其中的真女人——真英雄。似乎那全是分外苍白的“官方说法”。尽管不断意识着、警惕着镜城中的迷惑和诱人的召唤，但仍然是犹在镜中。拒绝、反抗暴力，不意味着用尚鲜的血迹，宽恕已成黑紫的旧痕；立场的选取和差异，对立的消解和抹平，只能意味着别一镜城中的再度痴迷。

不错，无论对正在亲历的当代，还是已湮没不可考的远古，历史的书写只能是断编残简。书写历史者已先在地被历史书写。知道这些，并未获得游戏的从容。身在家国之内，寻常日子，为女为妻，时被蝇营狗苟的私欲牵动。这是一回事。犹在镜中，但始终尝试指认幻象，并尝试破镜而出。